

【哲学研究】

# 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及其演进\*

李圣强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易传》是汉代易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在宏观上参与了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彰显了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也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持续完善。

**关键词:**汉代易学;国家治理;德治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3-0112-05

《易传》是汉代易学的主要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先秦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作为诸子之学之一,虽然没有与现实政治实现紧密结合,但《易传》在本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基本前提基础上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充分准备。

儒学政治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儒学化是汉代突出的国家治理特色,易学作为儒家的核心内容,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了国家治理之中。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宏观上自始至终参与了与两汉政权相适应的统治秩序的构建,突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二是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充分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政治、社会活动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三是在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彰显了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四是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

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持续完善,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与阴阳灾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天人合一、天人和諧有序,是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

## 一、易学与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

夏商周乃至秦在其王朝建立之前,皆兴起于历史悠久之方国,皆有其成熟的治国理民模式。汉帝国进行政治与文化重建时,以布衣出身得天下的刘邦统治集团,没有一套成熟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可供继承与发展,也不具备先秦统治者所倚重的继业垂统所能带来的政权合法性,武帝在诏举贤良对策中所册问的首要命题即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sup>①</sup>

陆贾对刘邦谏言儒学对构建国家统治秩序之用,指出了“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天”对于人间秩序确立的重要作用,“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

收稿日期:2021-04-15

\*基金项目:潍坊科技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资金项目“认知科学视域下汉魏时期农业科技与人文科学的互动研究”(SKRC2021004)。

作者简介:李圣强,男,潍坊科技学院农圣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寿光 262700)。

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sup>②</sup>。指出五经六艺乃圣人“承天统地”之作、“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之作<sup>③</sup>。汉初70年的恢复性发展后,社会基本稳定,国力相对富足,政治上、思想上的大一统进而成为契合时代需求的更高层次的国家治理追求,黄老之学短暂性、权益性的表演谢幕之后,儒学正式登上了国家治理的中心舞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核心内容是“务为治”,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关于治国之道与术的探讨,为经学最终走上政治舞台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儒学在内的经学在汉代成为大经大法,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宪法”,开启了经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儒学政治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儒学化是汉代突出的国家治理模式,儒学作为意识形态中的最高价值原则渗透于、运用于、实践于汉帝国的政治领域,儒学成为帝王平治天下的学理依据。易学作为儒家的核心内容,自然而然地参与到了国家治理之中,易学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因时乘变、因势乘变、经世致用的极高实用性,是其高度政治生命力的源泉。

马王堆汉初帛书记录了孔子对《易》的言论与定位。《繆和》篇载:“夫《易》,上之治也。古君子处尊思卑,处贵思贱,处富思贫,处乐思劳。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以长又丕利,而名与天地俱。”<sup>④</sup>刘大钧教授认为:“正是孔子对《易》的这种定位,才使《易》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由秦时的‘卜筮之书’而跻身于‘五经之首’、‘大道之源’。”<sup>⑤</sup>帛本《系辞》:“立何以守立,曰人。何以聚人,曰材。理财正辞,爱民安行曰义。”今本《系辞》做“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对于帛本与今本的差异,刘大钧教授认为:“证明了今本《系辞》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对古《系辞》的修订本……‘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是在统一天下后,其(汉武帝)治国理念的自然写照……可证主持今本《系辞》整理的儒生们,当时为迎合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不符合当时政治需求的文字皆作了修改与删削。”<sup>⑥</sup>这说明汉代易学的确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活动中。武帝时,立杨何为《易经》博士;《史记·日者列传》记载了司马季主对卜筮的认识,“今夫卜者,必法天地”<sup>⑦</sup>,此皆反映了易学在当时的重要地位。法典化的《易纬》成书于西汉儒术独尊时期,《易纬》以“经天地”“理人伦”“明王道”为宗旨,备受当时统治者重视。《易纬》多假托孔子之口而阐述,从而使其卦气说象数

易学理论体系具有了神圣化的色彩,《易纬》本书也具备了经典性、权威性的特色。

《白虎通义》在东汉地位特殊,政治上具有“国宪”地位。《白虎通义》总共论述了44个专题,内容涵盖了伦理道德、风俗、礼仪乃至国家制度。《白虎通义》直接引用《周易》原文的有25处,论及《周易》的有7处,其中的《蓍龟》一节专门论及龟卜、占筮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内容的背后大多能找到卦气说象数易学思想的身影。这说明“易学的卦气说作为一种高层次的天人之学不仅为经学中的各派所共同承认,而且被居于最高决策地位的君主正式接受为国家政权的指导思想”<sup>⑧</sup>。

汉代易学之集大成者虞翻称:“经之大者,莫过于《易》。”<sup>⑨</sup>《易》为六经之首,蕴含帝王法天道而立王道平治天下的学理依据。虞翻的“成既济定说”揭示了社会秩序本于天道积极的、动态的、发展的、生生不息的自我修正能力。“成既济定说”也揭示了易学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关切与统治集团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关切是一致的,易学家们所构想的和谐有序的政治秩序,为统治集团的国家治理提供了理想的目标与方向。

卦气说是易学与历法相结合的结晶,是两汉易学家解读《周易》理论、构建筮法体系的主要途径与理论根据。汉之卦气说象数易学旨在构建一个既明天道又切人事的理论体系,并实践于两汉统治秩序之构建与维护。两汉易学家致力于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希冀通过效法天道来规范人的行为、调节天人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与平衡;希冀通过君臣自身的修养德性、政治改革来感化天,进而顺应天道,找到天人合一的行动准则。探索与构建适合于时代需要的、适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统治秩序因而成为两汉易学与时俱进的历史性任务,而卦气说象数易学对于汉代统治秩序的稳定、政权的巩固也确实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 二、易学对汉代国家治理的影响

汉代的谶纬神学不仅神化帝王,也将儒家圣人尤其是文王、孔子的地位神化到了极致,儒家经典被认为是经天纬地的绝对真理,圣人受神灵之感应,可以传达天意,孔子作《春秋》《易传》等著作是为汉王朝制命立法,圣人和圣人之言受到了极度推崇。

秦汉之际“天人感应”、自然灾害之说普遍流

行。董仲舒的灾异思想有突出的代表性。董氏言灾异的理论根据来自《春秋》和《周易》，用易学理论对春秋时期所发生的灾异、祥瑞等自然现象进行诠释，并与当时的时政、人事进行联系，探究其中可能存在的某种关系。清人皮锡瑞认为汉代灾异之说“亦易神道设教之旨”。“神道设教”一词最早出现于《易传》，《观·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传》所推崇的“神道设教”以先圣为楷模，以神道为手段，言灾异是两汉主要的神道设教手段，统治集团相信灾异是上天对君主不当行为的警示与告诫。对阴阳灾异的占验、解说与应对，是汉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君主治理天下，也是大臣左右朝政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占验派卦气说的象数易学体系，就致力于为阴阳灾异解说服务，为现实政治服务，进而对社会政治进行指导与调节。

以象数易学为根基的两汉灾异思想在君权之上设置了一个可以限制君权无限膨胀的“天意”，易学掌握了对灾异所展现的“天意”进行解释的密钥，为士大夫参政议政提供了可靠的途径与平台。士大夫凭借解释灾异之机，影响朝政，匡救时弊，借阴阳灾异批评政治得失，借“天意”制约君权，使统治集团具备了一定的自我纠错能力。董仲舒在其《贤良对策》中指出其言灾异的本旨：“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谬盪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sup>⑩</sup>灾异思想的神道教化之用主要是教育统治者行仁政重德行，教育统治者恐惧修德，垂范天下。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基础之上，京房表现得更为深入，将天人相感系统地落实于易学之政治实践中。在京房看来，天道与人事是同构的，天道运行展现人事变化，“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sup>⑪</sup>。京氏易学参与国家治理的目的非常明确，“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sup>⑫</sup>。阴阳灾变说也是京氏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参政议政的重要理论武器。

早在文帝时期，就有了对灾异采取相应政治措施的记载。到了汉宣帝时期，因灾异而采取相应政治措施的应答天意的记载比文帝时期更多。从臣子对灾异的解读以及帝王采取的政治措施看，一是将灾异与帝王自身的德行、治国之才能相联系，认定“人主不德，布政不均”是灾异原因之所在；二是对

天意应答的具体政治措施多集中在赏赐吏民、修刑政、宽舒民力等方面，这两方面的措施体现了易学对汉代国家治理的具体指导与调节。阴阳灾异之占验解说与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表明了汉代易学的政治化、工具化及神学化特征。汉代易学与灾异说的结合，对于士大夫阶层与易学学者来说有规范君德与限制君权之用。汉代易学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

### 三、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

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董仲舒发挥了关键作用。董仲舒借五帝三王之政描绘的理想社会是两汉易学家所追求的目标，这个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包括：明德慎罚、重德轻刑、轻徭薄赋、教民礼仪、天人和谐有序、社会整体和谐等。

汉之卦气理论形成和定型于孟喜，孟喜以震兑坎离所谓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一年二十四节气。京房在继承孟喜卦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六卦卦气说，以四正卦和巽艮“六子”卦主二十四节气，具体言之，即每卦取初、四二爻，每爻主两个节气，六卦十二爻主二十四节气。《易纬》进而用乾坤巽艮作为四维卦对四正卦予以补充，即易学史上“四正四维”说，用八卦主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每卦四十五日）。同时，《易纬》还采纳了孟喜、京房的六日七分思想。卦气说在实践上将天道运行与统治秩序是否和谐结合在了一起。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追求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整体和谐，卦气说实际上就是汉代易学家遵循这一理想蓝图构建而成的。汉代易学家所创设的象数模式与象数体例既用于认知天道，又用于人事决策的依据，以“天意”限制皇权就成为易学家们为追求理想政治制度而干预朝政最常用的手段。

东汉自和帝至献帝一百多年间，即位的九个皇帝全是幼童，皇权实际上旁落于母后、外戚、宦官手中，儒家所倡导的价值理想基本丧失，经学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专权者欺世盗名、谋取私利之工具。大批儒者迫于政治黑暗，纷纷远离政治及官学，回归私学成为儒者普遍向往的一种风尚。虽然儒家参与政治的方式有所变化，但儒家的担当意识没有改变，儒家与生俱来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经世致用的核心追求没有改变，“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

时”<sup>⑬</sup>是其生动写照。无论暂时栖身于朝廷还是隐居乡野,儒家仍以易学为武器评议时政,表达其社会政治主张,以期改善朝政、挽救时局。易学也顺应时代的潮流,由占验派象数易学向注经派象数易学逐渐转向。刘玉建教授认为,在郑、荀、虞为代表的后象数时代,尽管其易学的现实政治意义与作用被消解,但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理想却是异常的强烈,这与现实政治的极度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怀有社会责任感的易学家与经学家,对于如何恢复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结束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等政治性根本问题,给予了积极的思考,并提出了政治主张。<sup>⑭</sup>

东汉时期的马融开启了以传解经方式注经的易学新风,并且继承了费氏易学以传解经的传统,初步恢复了《易传》的义理倾向,以人事政治的理性义理取代了京房与《易纬》卦气说象数易学以天人感应、阴阳灾异为理论基础的神学义理。<sup>⑮</sup>荀爽继承了京房与《易纬》的爻象爵位说,以五爻为君、二爻为臣;其阴阳升降说中的乾升坤降彰显了荀爽对君圣臣贤和谐政治秩序之追求与期盼,对外戚宦官专权、王权旁落黑暗政治之不满。荀爽等东汉易学家在东汉黑暗政治之现实下,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仍不放弃《易传》天人和谐、社会整体和谐有序的儒家和谐价值理想的终极追求。

郑玄穷尽一生智慧于易学,善以史解易、以礼解易,通过易与礼的结合指正时政,也曾试图用经学助力社会秩序的调整,以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郑玄一生虽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励志为学,但并不代表其治学远离政治。郑玄易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流行于朝野,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足见其服务于社会、政治的极强实践性。郑玄的以史解易中不乏为三皇五帝歌功颂德的内容,但也同样体现了郑玄在东汉黑暗政治之现实下,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

#### 四、汉代易学与儒家德治思想体系的持续完善

《易传》对“天”的主宰亦即道德之义尤为关注,《易传》所构建的天人关系及德治思想体系为历代王朝之国家治理与时俱进地提供了因势乘变的理论上、思想上的支持。《易传》反复申明其推天道的目的在于明达人事,正如郭店楚简《语丛一》所谓“《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易传》本着推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理论基础,研究与探索治乱

兴衰的社会政治规律与国家治理之道。《易传》也反复强调其理论体系的履践性如“成务”“大业”“吉凶”等,也即《系辞传》所云:“夫《易》开物成务……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实际上就是指易学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具体实践性,而且《易传》的实践性要求是高于儒家其他典籍之上的。《易传》突出强调“《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在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体系下,《易传》论述了阴阳二气进退消长、“消息盈虚”、体现天道循环变化之理的“一阴一阳之为道”,揭示了一年四时节气、物候之天道变化及与体现天道的人道之社会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以期达到人道顺从天道的整体和谐之境界。

汉代易学的主流是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所谓卦气说,即按照一定的规律,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与一年之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相匹配。卦气说象数易学旨在构建一个既明天道又切人事的理论体系,服务于统治秩序之构建与维护。日月按其本然规律运行、节气按其本然规律交替、万物按其本然规律兴衰是天道,而易学的使命之一就是明天道,易学又是切人事的,教人理解天道、尊重天道,并按天道之本然规律行事。

依郑玄之见,六十四卦卦气有君臣尊卑之分,消息卦为君,其他杂卦为臣。一年十二月中,君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消息卦和杂卦之作用和地位是有差别的,君为主,臣为辅,消息卦胜于杂卦,且不得越位。郑玄等汉代易学家认为天灾是人的行为所导致的,如果天子失德,君臣关系错乱,上天会迅速回应,自然灾害就会产生,天人感应有着极强的时效性。君臣失道、君不圣臣不贤是导致灾异的主要因素。要免受灾异之苦,则需要效法天道,即所谓“常则天而行,与时消息”,君圣臣贤,效法天道,进德修业,通天意,理人伦,施政教,则可灾异消除,风调雨顺,天下昌平,即所谓“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们取昌”。<sup>⑯</sup>

儒家德治思想渊源于周初以文王、武王和周公为代表的“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德政思想及实践,周公把德治提升到了治国安邦的高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使渊源于周初的德治思想更加完备与系统化,为两汉儒家德治思想真正服务和实践于国家治理做了坚实的准备。

两汉五经博士的设置使知识分子有了参政的机会,知识分子因此具备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能力的制度支持,儒家所提出的政治理想,也因此有机会渗透到政治制度的构想中去。两汉知识分子通过推崇德治来反对法家、反对刑治,期冀皇权专制能在德治的轨辙上运行。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儒家的治国理政之实践真正地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对于董氏为何推崇儒家,徐复观先生如此评价:“他(董氏)的反对纵横家,是为了求政治上的安定。他的反对法家,是为了反对当时以严刑峻罚为治。他的推明孔氏,是想以德治转移当时的刑治,为政治树立大经大法。”<sup>①⑦</sup>董氏在其《天人三策》中明确要求以“德”代“刑”,以教化之官取代执法之吏。将现世间的价值问题与天连在一起,以天道为一切价值的最高标准,乃是董氏天的哲学的动机和方向。董氏在政治理想上追求尚德贬刑,并以天道观作为尚德贬刑之政治理想的理论根据,提出君权神授,目的在于要求人君知天法天,将人君的言行,纳入董氏所主张的与天道相配合的君道之中。

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与阴阳灾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天人合一,天人和谐有序,是德治思想之基础,也是德治思想实践的终极目标。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持续完善。以德治为基本内核的传统政治理念,规范和指导着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具体政治

实践,以德治为基本内核的传统政治理念也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实践中推陈出新、不断完善。以德治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传统、融合血缘宗法与等级观念的典章制度、彰显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实践是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以德治思想为内核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深刻地影响并沉淀于古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朝代屡有更替,但这一国家治理体系保持了大致的稳定,这一国家治理体系也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文化观念的深度融合和普遍认同。

#### 注释

- ①[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2172页。②③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道基》,中华书局,1986年,第9、18页。④廖明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92页。⑤刘大钧:《〈汉代易学通论〉序》,刘玉建:《汉代易学通论》,齐鲁书社,2012年。⑥刘大钧:《再读帛书〈系辞〉》,《周易研究》2016年第4期。⑦[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3218页。⑧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63页。⑨[汉]陈寿:《三国志·吴书·虞陆张骆陆吾朱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322页。⑩[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2175页。⑪⑫郭彧:《京氏易传导读》,齐鲁书社,2002年,第135页。⑬[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荀爽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058页。⑭⑮刘玉建:《汉代易学通论》,齐鲁书社,2012年,第283、252页。⑯《易纬·通卦验》,林忠军导读:《易纬导读》,齐鲁书社,2002年,第199页。⑰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一),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72页。

责任编辑:涵 舍

## The Pursuit of the Yi Ology of the Han Dynasty to the Ideal Political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Li Shengq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states Period, the debate of the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cluding *Yi Zhuan* on the law of governing the turmoil, the rule of rises and declines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made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the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acquiring the legitimate status as the governing thought. *Yi Zhuan* was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principle of Han Yi Ology, which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uling order of the Han Dynasty in a macro way, reflecting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onfucianism as the governing thought of the Han Dynasty. In a micro way, the establishment of Ghosts and Gods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eaven and mankind and Yin Yang disasters and changes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guiding and regulating the state governance with the help of practicing divination of and predicting disasters, eccentricities, happiness and blessings. *Yi Zhuan* highlighted its pursuit for and exploration of the ideal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Han Yi Ology, and the Confucian virtue rule thought system beginning with *Zhou Yi* and the early Zhou rulers also got improved continuously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Yi Ology of the Han Dynasty; state governance; rule of virtue